

作品论要贴着作品写

张鹏禹

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曾选修过沈从文先生的几门课,他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套用这句话,如果说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叙事修辞,作家心里都要始终装着人物、贴着人物写;那么,批评家的作品评论就要始终贴着作品写、围绕作品本身展开。

作品论“贴着作品写”看似理所应当,但在今天老调重弹却并非无稽之谈。当下的太多作品评论充斥着与作品无关的杂质需要剔除,“贴着作品写”俨然成为一种奢侈。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既关乎批评的有效性,也与形成良好的批评生态密切相关,或许还有助于摆脱泛媒介中,专业作品评论式微的局面。

贴着作品写不是掠过作品写,自己在那里自说自话,却把所评对象落在后头。批评家首先要剔除的就是与作品无关的大量背景知识。有的作品论开篇动辄从天边谈起,仿佛要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一路说来,拉拉杂杂一大堆,就是不进入主题,不谈作品如何。文章的切入角度大而无边,如此一来,自然会让读者耐心不足。有的作品论把作家的前世今生挖个底掉,俨然一部微型作家传记。或是把作家的创作历程一一罗列出来,一大串书名号排排坐,十分扎眼。还有有的历数作家的获奖履历,好像创作出这么多佳作的作者,这次写的一定也是好作品。更有甚者,写作品论却大谈自己与作家的个人交往、私人感情,不知这与作为评论对象的文本有什么关系。

掠过作品写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立场、理论信仰作为作品论的核心。有点类似于叙事学理论中作者的“抢话”,批评家绕开作品开始夸夸其谈,而忽略挖掘作品本身的内在特质。所评作品本该是作品论关注的焦点,是主角,却沦为评论家观念的注脚。千万别忘了,作品论不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些本不该是作品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要过多掺入其中。譬如对一些文艺理论的阐释,评论对象不该为证明某个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正确性的工具,相反,理论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更好地找到理解作品的钥匙,感知作品的魅力,享受共鸣的快感。如果不能摆正理论与作品的关系,必然会造成理论空转或是驴唇不对马嘴。以我浅薄的经验所见,不少作品论都有大段删除的余地。只有挤出水分,才能留下干货和精华。

贴着作品写不是照着作品写。一些作品评论变成了作品的内容提要或是故事大纲、故事梗概,仿佛到剧院看话剧拿到的节目单、宣传册。诚然,对作品内容的提炼、概括、归纳、总结是作品论必须涉及的内容,也是阐发观点不可缺少的论据,但大篇幅的引用,大段的概述不仅会损伤评论文章的结构完整性,也容易让真知灼见淹没在故事情节复述的汪洋大海中。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是专业人士来谈,心中早已明了作品内容,自然用不着评论家大费口舌“拾人牙慧”;若是未看过作品的一般读者,即使读了作品论里的复述,也难以从中窥见作品全貌,况且枯燥乏味的复述怎比得上元气淋漓的原著?倒不如留下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抛砖引玉,引发读者找来作品一读的兴趣。

贴着作品写也不是钻到作家肚子里写。批评家与作家、作品论与作品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是博弈、对抗、较量的关系,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学生态。正如李健吾所说,“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不是老迈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一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但现在的文艺评论中,“说好”与“说坏”的比例已经失调,文学批评似乎变成了“文学表扬”,其中的原因很多,也与批评家的评论动机有关。网开东西不满意时,消费者的投诉欲强,留言写差评的概率大,相比之下,文学评论正相反,批评家更乐于评价自己喜欢和欣赏的作品。面对自己青眼有加的作品,就更需要拉开一定的视距,警惕挖空心思迎合作家的心理。比如,在评论作品的过程中,应该冷静看待作家的创作谈等诸如此类对作品的自白,理性检视“创作谈所宣扬的”与“文本所呈现的”之间的关系。这样说不否认创作谈和作家“夫子自道”的意义,相反,它们很可能是读者(包括评论家在內)解开作品密码的关键;也不意在弘扬英美新批评那种割裂文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做法,相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文论观依然焕发着现代光辉。这里强调的只是,作品论要贴着“作品”而不是“作家”,意在防止批评家在作品论中成为作家的传声筒,过于信赖或者依靠作家自己对作品的“权威”解读。批评家不是作家肚里的蛔虫,也不是作家的应声虫、跟屁虫,而是外在于作家的作品研究者,应该有独立的批评人格与“文格”。再再说,创作谈何尝不也是一种“文本”呢?

说了这么多“不是”,“贴着作品写”是什么呢?我以为,是挖掘出一部作品最内在的本质和最突出的特点,进而在广阔的文学史坐标中对其进行定位。现实主义文论强调文学创作要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套用到作品评论上,一篇优秀的评论就是要挖掘出作品的典型特质。批评家要有能力拨开作品语言的迷雾,拆解阅读的重重障碍,层层闯关,穿透故事、情节、修辞的迷雾,解除作家的“武装”,与作品的灵魂相遇。在这一点上,李健吾有着精辟的论述:“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说是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剔别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唯有贴着作品写,才能实现批评家与作家和作品灵魂的相遇吧。



对文学精品出版的再思考

路英勇

就文学精品。

进入文学史是文学精品出版的目标

文学精品是否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应该成为文学精品出版的基本估量标准。这也是检视文学出版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学出版只有引入文学的史的维度,才能实现优中选优,形成一种倡导社会效益优先的正向激励效应。

文学出版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短期效应,而应着眼于文学的发展,从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判定作品的价值。所谓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精品,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史学性的经典作品,比如屈原的《离骚》、李杜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表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而且能够达到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渗透着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执著探索的精神。一类是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如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的孙犁、刘绍棠,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马烽,伤痕文学的卢新华、刘心武,反思文学的茹志娟、张一弓,改革文学的蒋子龙、高晓声、寻根文学的莫言、张炜等,可以说这些作家的代表作进入文学史最早是通过文学流派的影响而实现的。从总体上看,二者的文学史意义各具特点,前者通常出自文学巨匠手笔,因缘际会而成经典,可遇而不可求;而后者来自于辛勤耕耘的文学追求,是经常可见的,也是文学精品出版最应关注的情形。

文学出版不能单纯追求图书的销量,但文学作品毕竟具有商品的属性,是消费时代文学出版经济效益的来源。消费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有文学史的意义,只要理性地看待文学的商业性,就会拓宽我们对文学精品含义的认识。美国学者泰勒·考恩在他的《商业文化礼赞》中告诉我们:“伟大的文学常常在低质量的畅销书高居排行榜首时得到蓬勃发展。我们认为18世纪的英国小说就是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理查森和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然而,畅销书作家——爱德华·金伯、亨利·麦肯齐、理查德·谢里丹以及理查德·坎伯兰——的声誉那时至少不在他们之下”;“同时也不能忘记,今天的商业性题材常常提供了明天的经典。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是书信体言情小说,这种题材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嘲笑。”我们要知道,“伟大的文学”和“低质量的畅销书”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却能够共生共存;我们也不能认为凡是畅销的就是低质量的,凡是商业性题材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文学精品。泰勒·考恩举出《帕美勒》和《克拉丽莎》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金庸《射雕英雄传》和《笑傲江湖》的例子。商业性题材对文学的价值认定提供了新的历史样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和我们古代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虽然它们在当时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但当后来的人们要从此前的历史中寻觅文学精品的时候,这些作品便成为被认定的对象。由此可以说,文学精品出版将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作为目标,其基本的出发点应该在于,出版者要坚守对于文学价值的公共评判标准,但也要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相信自己的价值判断,对那些融合新质的文学探索持包容态度,这不仅是尊重文学多样化的要求,也是具有文化品格的出版者推动文学发展应有的态度。

作家出版社文学精品出版的实践

作家出版社历来重视文学精品出版,作为中国作协下属的文学专业出版社,紧跟时代发展,引领文学风尚,出版了大量文学精品,为我国文学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50年代建社之初,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文学名著。80年代推出的“当代小说文库”“文学新星丛书”“作家参考丛书”等,曾引起广泛关注。90年代出版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曹文轩的《草房子》等获得重大社会反响。进入21世纪,王蒙的《尴尬风流》、贾平凹的《秦腔》、张平的《国家干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李佩甫的《生命册》、陈彦的《主角》等相继出版,也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各类重要奖项近百个。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他们的第一本书或代表作,大部分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品牌受到作者和读者喜爱,在国内外有口皆碑。

近年来,为进一步鼓励文学精品出版,作家出版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编辑团结广大作家,积极策划不负时代的文学精品。2019年底,《关于加强“双效”原创文学精品图书出版的意见》颁布。2020年初,年度第一批“双效原创文学精品”出炉,8部名家新作榜上有名:贾平凹的《暂态》展现新时代女性的独立风采;王蒙的《笑的风》盘点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和风云际会;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通过众多的奇人异士,展现天津卫的市井百态;王松的《烟火》打开百年天津的文化画卷,是津味小说的又一里程碑;刘庆邦的《女工绘》以诗意、崇高、华美的笔触,塑造了后知青时代丰富多彩的女工群像;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是继《人民的名义》之后,聚焦国企改革现实主义题材新作,将于近期与同名电视剧同步推出;张之路的《吉祥的天空》细致描摹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切中时代脉搏,反映时代变化;蔡骏的《春夜》围绕一个工厂的历史和两起悬案,展示了大上海众生相。6月,又遴选出年度第二批“双效原创文学精品”,贾平凹、曹文轩、张平、何建明等名家的新作入选,也将成为作家出版社本年度文学精品出版的又一亮点。与此同时,余秋雨、关仁山等多位名家的新作也将陆续亮相。

当前,我国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作家正在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来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壮阔图景。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画上句号,作家出版社积极应对时代要求,特别策划了“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系列丛书”(10种),包括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吴克敬的《耕梦索洛湾》、蒋巍的《国家温度》、任林举的《出泥潭记》、哲夫的《爱的礼物》等。这些作品将在今年9月全部出版,为我国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献上了一份厚礼。

今天,作家出版社已全面实现公司化运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经营管理机制,作家出版社一定会向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文学精品,使“作家”这个著名文学出版品牌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实践证明,在出版经营中,精品的力量是巨大的。精品是出版文化品质的表征,是出版核心竞争力的源泉。真正意义上的精品,能够使出版企业占据优势竞争地位,获得良好社会效益,并能使之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文学出版也是一样,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统一,绝对离不开文学精品。

深刻理解文学精品的时代意义

什么是文学精品?文学精品就是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

文学精品至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个性化。凡是文学精品都烙印着作者特有的审美个性。成为精品的文学作品,永远属于“这一个”。“这一个”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们对于这一作品的排他性的意义认同。因此,富有审美个性的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即使面对内容高度同质化的作品,人们也会很容易从中把它辨识出来。二是创新性。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创新性规定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是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精品的决定性条件。文学精品必然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的产物,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三是时代性与史学性的统一。文学精品既是时代的产物,富有时代精神,又具有文学史意义。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文学精品。这些文学精品在这一时代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而在面向未来时,它们的意义还可以不断地被延伸、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被发现。时代性与史学性的统一,正是文学精品的要义之所在。

文学精品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回响、时代的旋律。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天然的,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无论是表现当下还是回溯既往,都离不开对所处时代的呼应和表达。脚下的土地是作家写作的永恒主题,而时代的呼唤则是作家的文学责任和艺术使命。离开了时代,不能与人民的情怀同声相应,不能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只有为时代留声,为进步聚力,善于从时代潮流中呈现思想撞击心灵的感动,使精心创造的艺术形象对于时代表现出特殊的美学意义,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编辑眼光关乎文学精品出版能力

编辑眼光有两层意思:一是选稿标准。选择是编辑的本质特征。说到底,编辑所做的就是一种选择工作。选择属于人的主体活动,必然会有倾向性。清代沈德在《古今词话·词品下卷·选词》中转述《梅墩词话》语曰:“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总难言当行者。文人选词,为文人之词。诗人选词,为诗人之词。等而下之,莽鹫者胜,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这里说的就是选稿的倾向性。既然有倾向性,其选择标准也就寓于其中。萧统编《文选》,把“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作为入选标准,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般来说,文学编辑的选稿标准,一方面取决于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主观性认定,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对可能存在的阅读需求的前瞻性判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选稿标准是由既是个体(编辑)又是群体(出版社)的文化道德体系来决定的。个体(编辑)与群体(出版社)在这一点上往往融为一体,相互影响,并相互成就。其实,这也就是文学出版品牌的价值所在。品牌效应确立的编选标准,是能够吸引优秀作家、推出文学精品的重要因素。

二是出版理想。上世纪30年代,巴金主持文学出版重镇——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把自己定位为“理想事业的实践者”,把文学出版活动当成“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条途径。巴金晚年曾对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有过回忆,他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很容易使人感受到他对文学出版事业的真诚热爱。更重要的是,他怀有‘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崇高出版理想,所以才能推出一部又一部记录时代、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文学精品。

选稿标准是高还是低,是否怀有崇高的出版理想,决定着编辑眼光的高下,关乎文学精品能否不断生成。编辑眼光的敏锐性、前瞻性很重要,编辑必须了解作家的最新创作情况,发现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追踪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甚至能够预见文学发展的趋势,这是发现文学精品的基本功。但编辑也不能只盯着那些一味趋新求异的作品,艺术创新也要兼具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要认识到,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置之新的时代视角下,同样能够成

(上接第1版)

以创新的形式打造精品力作

书写脱贫攻坚,考量作家们求实创新精神。惟有创新,才能让脱贫攻坚题材避免“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现象。

报告文学在四川文学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的内核,文学的表达”,成为不少四川作家对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走创新之路的共识。一个真实生动的故事,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核和哲理,胜过几千字的报告。杜绝空泛地阐释大道理,运用老百姓的现身说法,让人从中真切感受到脱贫攻坚的意义、作用、影响。这是一批又一批四川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的留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作家马平通过对广安、绵阳、遂宁、广元等地多个贫困村的走访,积累了大量素材。他结合多年对川北蓑蓑锣鼓民俗的调研经历,以及自身从家庭中受到的川剧熏陶,将川剧、蓑蓑锣鼓等地方文化和民俗融入于中篇小说《高腔》的创作中,让这个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不仅人物鲜活,富有典型意义,而且增加了地域文化的底蕴与厚重。作家曹胜利的《春风》开篇采

用电影闪回的手法,讲述王家元从外出经商到反哺乡亲的全部过程,展现了当代基层优秀干部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作家阿克鸠射的《悬崖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悬崖村”脱贫攻坚故事,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作家陈果的《听见——芦山地震重建故事》语言生动形象,36个故事构成一幅宏阔的重建画卷,鲜活地再现了芦山地震灾区重建历程,立体展现了重建亲历者追逐梦想、勇闯新路的坚韧品格和砥砺前行、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作家马希荣的《村上一棵树》则在结构上体现了丰富性和多变性,通过不同的结构形式,挖掘出了这些人物身上蕴含的担当精神、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作家章泥创作的《迎风山上的告别》通过儿童的眼睛和心灵,讲述精准扶贫带来的乡村巨变。

3年多来,在四川省作协“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中,除上述提到的作品,还涌现出其他一大批视角独特、立意新颖、表达手法多样的优秀作品。如今,四川各地作家正以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姿态,不舍分秒地奋战在脱贫攻坚文学创作第一线,为决胜全面小康作出积极的贡献。(刘裕国)

Advertisement for 'Starfire' (星火)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including '品位纯正的文学 气质新潮的文学 性情温暖的文学'.

Advertisement for 'Zhongshan' (鍾山)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including '《鍾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180.00元'.